



张仲鲁（1949年）



任访秋（1985年）



， 贺升平（1956年）



王凌云（1962年）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在工商部和善后事业委员会工作的回忆·····  | 张仲鲁 ( 1 )   |
| 建国前的河南田赋及其管理机构·····     | 王竹亭 ( 19 )  |
| 抗战胜利后杜秀升接收开封商务会经过·····  | 白晴峰 ( 27 )  |
| 五十年來在治學上走过的道路·····      | 任访秋 ( 31 )  |
| 回忆河岳通讯社·····            | 张剑石 ( 52 )  |
| 我的老师尚天培·····            | 段超群 ( 56 )  |
| 贺升平自述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 63 )      |
| 在开封训政学院受训的回忆·····       | 张止宇 ( 73 )  |
| 开封青年学社及《三民主义》之传入河南····· | 王光临 ( 77 )  |
| 王光临事迹片段·····            | 陈兆新 ( 81 )  |
| 1945年至1948年郑州见闻·····    | 王永川 ( 91 )  |
| 从办民团到入緬作战·····          | 王凌云 ( 121 ) |
| 冯玉祥的主要谋士石敬亭·····        | 宋聿修 ( 169 ) |
| 忆第一战区游击司令部干部学校·····     | 郭景道 ( 179 ) |
| 在豫南挺进军的一段经历·····        | 田向前 ( 186 ) |

〔 质疑 · 订正 · 补充 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有关民众抗日同盟会的几件资料····· | 文 辉(192) |
| 对《我与复兴社和蓝衣社的关系》     |          |
| 一文的订正和补充·····       | 李茂永(197) |

### 〔补 白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中国红十字会沁源分会····· | 杨乃昆(18)      |
| 浚县试办新农村·····    | 刘式武(55)      |
| 安阳江枫剧社·····     | 张敬之(80)      |
| 昆明河南同乡会·····    | 周秀业(90)      |
| 三十二军汤阴抚恤难民····· | 殷时学 司丙午(185) |

## 在工商部和善后事业委员会工作的回忆

张仲鲁

收入革命人物

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，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毁，王云五主持了这两个机构的重建工作，从这时起，他开始显露头角。记得当时他还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过一篇文章，记述恢复这两个机构的经过。抗战期间，王以社会贤达的身份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。抗战胜利后，他又任行政院工商部长。我与王云五素昧平生，偶然的机会使我与他共事两年多。但因我们始终只是工作关系，因此我对他的政治活动、思想情况、私人生活等所知甚少。现仅就我在他手下工作的情况，以及与他所主持的部门有关的事情，回忆记述于下。

### 接受王云五委派，赴华南视察经济接收工作

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秋至1946夏这个期间，所有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从下江（四川人把四川以外的长江下游地区统称下江）迁到四川特别是迁到重庆的机关、学校、企业等，都在忙着复员。当时我是行政院经济部的一员，家居重庆已八年之久，大有安土重迁之意，乃应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之约，拟留该校相助为理，不再作东下之计。此议甫定，而原任经济部长翁文灏适于此时转任他职，经济部改称工商部，王云五任部长。而我与王

云五素不相识，能否合作共事，殊不可知，这就更坚定了我留渝之念。但当时我的部中职务尚未摆脱，王云五忽由南京来电，促我东下，我在该部并未专领哪一部门实际工作，也不是高级人员中的什么重要角色，而王云五居然打电相邀，并嘱乘飞机前往，我一时顿感受宠若惊。这大概由于王当过多年商务印书馆老板，与教育界人士交接较多，因而知道我在各大学混过几年，才对我另眼相待吧。欣感之余，我不得不遄赴南京，听候调遣。

我到南京后，王云五召集部中高级人员开了几次会，决定派我和张貽惠（前北京师范大学校长）分赴华北、华南视察经济接收工作，但孰南孰北，则由各人自行选择。去华北，主要是去北平、天津、青岛、济南等地。这些地方，特别是北平、天津，我是很想旧地重游的。不料张貽惠首先提出愿往华北，我又不便与争，加以华南各地包括广州、海南岛、汕头、厦门、台湾等地，我都没到过，乘此机会，漫游一番，亦为快事。王云五布置说，此番视察，是要了解接收实况，检查接收隐情。但视察哪些部门，视察步骤怎样，我概不明确，甚至连应用的表格，都事先没做好准备。就这样，我偕同工商部技士杨清海和另外一位广东人（名字记不起来了）匆匆出发了。杨清海以后转任天津工商辅导处技士和善后事业委员会技士，建国后他曾任中央煤炭工业部科长、太原煤炭设计院副院长等职。

我们首先飞到广州，那里有原经济部广州区特派员林继庸所设的办事处。广州区（包括广州、海南岛、汕头、厦门在内）的经济接收工作由林继庸一手包办。我们在广州市内的几个小厂如橡胶厂、氧气厂等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下，详细情形不能明了，亦不让明了。在广州停了两三天，林对我们酒席招待，视如上宾，广州市的几个大酒店如南园、西园、金城都去吃了。俗话说“吃

在广州”，真是名不虚传。但是，接收情形究竟如何，我们是渺乎其茫的，只能把林继庸的一纸报告和几张表格带回塞责。

几天之后，我们又飞到海口，这里是广州区的接收重点，设有办事分处，以原经济部矿业司技正冼闻熙为主任。林携其助手邝森扬陪我们飞往海口，盛宴招待我们后，由林、邝、冼相陪，看了几个接收过来的厂子和一些物资。在此，我们看到日军从台湾劫运过来的几千穷苦工人，住得狭隘拥挤，饿得皮包骨头，病的病，死的死，受尽了日军的残酷折磨。虽已经国民党接收，但景况仍没多大改变，屡经呼吁，始由台湾省政府把他们运回台湾。林继庸在海口停了两天，即又飞回广州。

在海口呆了两三天后，邝、冼二人又陪我们飞到海南岛南端的榆林港。那里虽有不少接收过来的东西，然重要些的早被军政两方偷偷运走处理了。据说军方的莫某（忘其名）和琼州专员蔡劲军都发了很大的劫收财。在榆林，我们参观了石碌、田独两个停产了的铁矿，矿场上堆有大量铁砂。日本投降前，这里是日本国内冶炼钢铁所需铁砂的主要来源。田独铁矿据说藏量不大，只几百万吨，石碌铁矿那时估计藏量有一亿吨。事实上两地藏量都绝不会只那么多，因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对国内已在开发的著名大矿如开滦、焦作、大冶等等，都还没作过精密勘探，许多富矿那时都被视为藏量不多，或藏量将竭，不值得增加设备，扩大经营。解放后经过详密勘探，精确估算，原估藏量都大大增高。田独、石碌这两个矿场在日军撤走时，并无多大损坏，而接收后，却破坏得不象样子，连田独矿场皮带运输机上的橡胶带都被割掉偷卖了。在榆林我也曾和榆林国民党驻军某师师长蒋某在他的师部晤面，他说他不敢与驻五指山之解放军接触，只是抱着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”的态度，守住几个重要据点。驻海口的某军军长

韩练成，甘肃人，北京大学毕业后，又进了黄埔军校，为人沉默寡言，不喜交际，据说，韩当时与解放军有互不侵犯之默契，蒋介石屡令其进攻五指山之解放军，他都托词按兵不动。建国后，我看到报载韩为甘肃省政协副主席，后又转任甘肃省副省长。

1946年8月下旬，我们飞回广州后，又顺便到香港呆了一天。在南京出发前，谈起视察路线，王云五告诉我们路过香港要谨言慎行，不要引起英国人的反感。香港本非也不可能是我们视察的范围，但从香港搭船转赴汕头较为便捷，加上我们都没到过香港，对这个商业繁荣、华洋杂处的小岛，都想去看看，并乘此机会去购买一些日常需用的舶来品。我们到港后，受到原经济部所属中国油脂公司驻港办事处的接待，在其办公室内凑和着住了一夜，次日又在主要大街上蹓了一下，只见大街上熙熙攘攘，十分繁华。当日下午，便匆匆忙忙搭船去汕头。在汕头，我们受到不在接收范围的汕头电灯公司经理高某的盛宴招待。两天后，又搭便船到了厦门。

厦门设有广州区特派员的办事机构，他们把我们安置在厦门饭店。厦门那时也已恢复繁荣，看不到多少战争创伤，尤其鼓浪屿小岛上，一幢幢洋房鳞次栉比。昔日鲁迅先生任教过的厦门大学，就在普陀寺海边。在厦门，我们仅粗略地看了一下属于经济部门接收的有限的单位，就急急忙忙登上国营招商局的一艘“国宁”号机帆船驶向台湾。本来，从厦门径直驶台湾南部之高雄港既近又快，但据说高雄海面每年八九月间风浪较大，国宁号为避风浪，不驶高雄，而驶基隆。但航程中也遇到了大风，船在海中不敢前进，为安全起见，抛锚几个小时，风止才又启航，及到基隆港，整整走了24小时。

基隆是一良港，湾入市区，岸边就有旅店、饭馆。下船时天

已傍晚，我们下船后，就在岸边一个旅店住下，次日才乘火车前往台北。在台北，受到资源委员会的招待，住在资委会的招待所。这招待所原为一日式旅馆，睡坐饮食都在地板上，上面铺着所谓榻榻米，颇为干净整齐，侍者全是青年妇女，这在当时国内是没有的，我们初见颇以为异。此时，属于经济部门接收的单位和物资都已由有关部门分别经营管理起来，较大的企业（商业和银行不在内）和厂矿如金瓜石铜矿、煤矿、炼油厂、化肥厂、制酸厂、水泥厂、制糖厂、造船厂、机器厂、炼铝厂等几十个较大单位都已划归资委会经营，对这些单位，我们谈不上视察，因为资委会此时已不属工商部。在台北和基隆附近，我们参观了一两个煤矿、基隆造船厂（实际只是修理而无制造）、化肥厂、制酸厂、金瓜石铜矿等单位。抗日战争后期，美国飞机轰炸台湾，各厂矿、企业所受损失很大，只有规模较小的厂矿已恢复生产，规模较大的金瓜石铜矿（据说是东亚头号大铜矿）破坏甚重，由资委会派人驻矿保管。在我们参观的煤矿中，有一斜井，见有女工头顶矿灯，身穿短裤，与男工一道从井口出，这是我们向所未见的。到一平洞参观时，我们坐在小轻便车之藤椅上，由一青年女工将我们推至洞口，当时心中十分不安，而资本家与矿厂职员每日来往矿口，都是如此行进，习以为常。

在新竹，我们参观了正在建设中的一个化肥厂、一座扩建了的水泥厂，一所规模不大的纺织厂。沿台北到高雄的铁路线上，我们在台中、台南等地还看了许多制糖厂，但都被美机炸得不象样子，其中只有六七所修复生产，年产量也不过七八万吨。在日本统治时期，台湾施行殖民地单一经济，大力发展甘蔗种植，建立大小糖厂40余座，每年出糖近百万吨。我们还看过两所规模可观的造纸厂，一处出产不大的石油矿，当时石油矿还有十来架钻机

在山坡上钻探。日月潭水电站当时只有两部电机修复运转，发电5万瓩，如全部修复可发电15万瓩。

台湾的良港，北有基隆，南有高雄。我们到达高雄时，被炸房屋多未修复，街道上虽非冷冷清清，而房屋却是稀稀落落。我们住在炼铝厂招待所（当时市内还没建起一个象样的旅馆）。这个厂亦是日本人所建，年产量1.2万吨，规模在台湾算是宏大的，但受到美国飞机的轰炸，损坏严重，正在修复。据说，资委会因财力不充，正与加拿大资本家协商贷款或合资经营。台湾当时没有铝矿，日本人统治时期，铝厂原料是由南洋一个小岛开采运来的。炼成之铝，全部运往日本使用，连一个制造铝碗铝锅的厂子都没在台湾建立，台湾人所用的日常简单的铝制器皿，都得依靠日本供应。高雄的日本海军炼油厂，规模颇大，亦被美机轰炸，损失严重，车间或全毁，或残破，我们参观时，只有很小一部分（记得是氧气厂）恢复生产，其余大部破烂不堪，尚未修复。另有一水泥厂，正在生产，尚可供应高雄一带的房屋修复及新房建设所需的水泥。

统观当时台湾全部工业，轻工业多，重工业很少，重工业的基础钢铁冶炼业则是缺门，由此也可见殖民统治之一斑。

我们在台湾视察了九天，本想多停些时日，多看一些东西，不料工商部忽来一电，叫我们即速回南京。于是我们搭客机飞沪转宁。这次赴华北视察的张贻惠，在飞往北平途中，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。

### 担任工商部天津工商辅导处处长

我们在台湾时，曾见报载王云五到庐山晋谒蒋介石，提出为了各地工商业的恢复与发展，由工商部在国内工商业中心城市分

别设立几所工商督导处，得到蒋的批准。当时我以为工商督导处一定权限很大，可以总揽各地工商业的管理大权，并幻想如果我能取得一席，当可大干一番，在工商业界一显身手。王云五回南京后，把设立工商督导处的提议拿到立法院审议，虽很快得到该院大会通过，然却把工商督导处之“督”字改成“辅”字。一字之改，关系甚大。那时一般人（包括我在内）感觉这样一改，这个机构的威权就没有了。但王云五并不因此而灰心。我们一到南京，王即召开会议，决定先在上海、天津、汉口、广州筹设四个工商辅导处，以工商部工业司长欧阳仑任上海处处长，我为天津处处长，刘庭芳为汉口处处长，广州处处长可能是郑丰，后来又在沈阳添设了一处，以杜春晏为处长。各工商辅导处共设职员17人（不包括工友）。在当时机构普遍臃肿庞杂、人多事少的情况下，这个机关还算是比较简单的。我们几个处长都原封不动地带着部中职衔，领命各赴指定地点筹备。但王云五并没有把工商辅导处的工作范围具体说明，同地方政府类似机构的职权如何划分、怎样联系、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等，概未加以规定，亦未具体交代。这就给我们的筹备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。

我于1946年11月先到北平，与原经济部特派员王翼臣接洽天津的房屋、家具、设备等问题，他慨允按照工商部的意旨，把他的天津办事处房屋、家具、汽车等全盘移交，他的天津代理人李洛之执行了他的指示，于是天津工商辅导处就于1946年12月底在天津长春道正式成立工作了。处中人事安置比较简单，除接收了原摊子的几个人外，以原中央工专教务主任王冠英（留美，习电）为主任秘书，以原南开大学教授杨颐桂（留美，习机械）、原河南省建设厅纺织厂厂长高家宝（解放后任天津大学纺织系教授）为技正（即工程师），以天津油漆专家周维尧、工商部交用人员

潘浙为专门委员。

初到天津，免不了有一番酒席酬酢。首先是天津“工业之王”、开滦矿务局总经理王崇植摆酒宴款待我们，当时在座作陪的除天津工商业界几个巨头外，还有开滦矿务局的实际老板英人普利耶。王崇植利用英国人在华的特权和开滦煤矿的财势，在天津广结声援，天津的许多重要事情，不管与开滦有无关系，不征求他的意见，谁也别想办，即使办也办不通。只是由于我是工商部的高级人员，又是来天津辅导工商，他表面自然要加以敷衍，但骨子里却看不起我们。因为开滦煤矿是当时国内唯一大矿，拥有雄厚资本和权势，又有官僚资本和英国人为后盾。一旦王发现这个辅导处权力不大时，他的态度便日趋冷淡。

天津辅导处开始工作后，部中仍没有具体规定工作内容。但既设了这个机构，我们就须找点事做。天津的官僚资本工业中，宋子文系统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的六个大纺纱厂，属于资委会的天津钢铁厂、天津造纸厂等，都是来头很大，可以直接“通天”的，根本不容我们过问，更谈不上辅导。民族工业规模大的如永利化学公司、久大精盐公司、东亚毛织厂、仁立织呢厂、恒源纺纱厂等，亦都是长袖善舞，各有门路，既不需要我们来“辅”，更不需要我们来“导”。需要我们给点帮助且我们还能给点帮助的，是一些中小型厂。经过粗略调查和了解，我们得知东北和山西大同、河北的井陉与磁县以及山东的中兴煤矿等处之工业用煤，因交通关系运不到天津，只有邻近之开滦之煤尚可利用，但因火车车皮被国民党军队扣留，私运货物，开滦之煤亦不能畅运到天津。宋子文的六个厂神通广大，无论形势怎样恶劣，它们总可得到源源供应，而中小厂无钱无势，常因缺乏原料而告停产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便与开滦矿务局交涉，每月拨一定数量的煤，交

工商辅导处，然后按需要分配给中小型厂，多者三五十吨，少者只三五吨。经过双方频繁协商，开滦才答应每月拨1000吨煤，经运输商人按分配表送给各厂，但后来我们发现运输商人有偷拿碎煤顶原煤之事，乃改发煤票，由用户自运。在分配这1000吨煤的过程中，厂方请托以及经办人员混水摸鱼之事亦曾发生。为了息事宁人，不让家丑外扬，影响机关和个人的荣誉，我们对这些人在工作上重新调配，未予以深究。

天津是我国纺织印染业中心之一，大型纺纱厂除前述官僚资本经营之六个厂外，还有民族资本家经营的恒源纱厂等。印染厂家则更多，但规模不一，大多为手工操作。辅导处曾由高家宝联系中小厂家和布商，办了几期织染技术训练班，起了一些作用。解放后高氏能留在天津，并在大学纺织工业系任教授，与此有一定关系。

天津为国内大埠，出口贸易相当繁盛，华北各省土特产如皮毛、猪鬃、肠衣、地毯等等，每年出口数量很大。为了联系出口贸易商人，辅导处成立了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，请当地较有声誉的出口商人和有关人士参加，研究推进出口办法。但因为战争，出口行业陷于停顿，出口商人悲观消极，虽开过几次会，但只是空谈一番，无补于实际。

在这期间，为加强控制工商业，工商部曾下令对全国工商业进行造册登记，印发了大批表格，叫积极办理。天津辅导处为此特成立了一个小组，由周维尧主持。此时工商业已陷绝境，工商界走投无路，一提登记，人心惶惶，都认为这又是蒋介石集团设计的一条压榨门路，所以相率躲躲闪闪，不肯认真登记。登记造册任务很长时间没有完成，而工商部把表格发下后，亦未认真催办。

天津工商辅导处所占长春道之房，系原经济部平津区特派员驻津办事处所接收的敌伪产业。辅导处成立之前，已由资委会天津各单位管理委员会（主委马思亮）把楼下一半占用。接着行政院成立了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，孙越崎（时任资委会主委）兼局长，天津市副市长张子奇兼副局长，所有平津两市各方面所接收之敌伪产业，统归该局处理。我与孙越崎原本相识，辅导处占用长春道房亦曾得孙许可。几个月后，马思亮想扩张地盘，他仗恃孙越崎系资委会主委又兼处理局局长，几次威胁要占楼上辅导处部分房屋，后见辅导处坚持不让，他又转而覬觐楼下辅导处办公室，并怂恿张子奇带着两名打手到辅导处办公室晃来晃去，说了一大堆不三不四的话，及我听说后下楼与他理论时，他仍态度倨傲。辅导处电王云五请示办法，王复电囑令就地解决。后来马思亮在另一街上找了一所房子，要辅导处搬迁，辅导处不愿再与他们纠缠，已允迁让，但不知何故，他们又不再威逼而让辅导处呆下去了。

由于工商辅导处的业务活动很有限，加以时局紧张，半年之后，我就有了退志，在协助北平派来的几个学生募集了一笔捐款之后，我即到南京观察形势。停了几天，也没有看出什么征候，便又回到天津。孰知那时蒋介石已同青年党做了一笔交易，把工商部送给青年党。我回津不久，工商部长即易为青年党负责人之一陈启天。我同陈启天素不相识，就由一个旧识青年党人（忘记是谁）介绍，到南京山西路住宅区见了青年党首领曾琦。我同他接触后，感到同青年党没有什么交道可打，但又不能不去看看新部长陈启天。我见了陈启天并把天津工商辅导处的业务作了简单汇报之后，即表示辞职之意，请他派人接替，他未免安慰一番，叫我照旧供职。随陈进部担任参事的青年党人郭甄太是河南同乡，

我们又相识，我把辞意告诉他，并劝他去活动接替，他当面表示谦逊，我回天津不久，报载王云五转任行政院副院长，兼善后事业委员会主任委员。我即把我离津的决心函告王云五，并表示愿回南京。没隔几天，他来电相邀，我便电工商部辞去天津工商辅导处处长之职，继任处长果然派了郭甄太。

### 行政院处理委员会和王云五主 持的善后事业委员会

我在天津接到王云五来电后，将天津工商辅导处的事务稍作捋挡，交主任秘书王冠英代为处理，即径赴南京王云五处，他让我任善后事业委员会参事兼第一组组长，主管计划。该会副主任委员为潘序伦，潘原任工商部常务次长，是当时国内有名的会计师。第二组主管农业，组长为马保三，但马因兼任其他工作，经常住沪，不常到会。第三组主管总务，组长黄孝先，是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时的老搭档。主任秘书徐伯齐，是王的亲信。另在上海设有办事处，主任为陈世章，字聘侯，系化学家。善后事业委员会的基于人马，大致如此。

善后事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事委会）是行政院的一个直属委员会，与各部地位相埒。顾名思义，凡属国内的善后事业，似应一律归它主办。其实不然，条例规定是叫它继承善后救济总署的未竟之业，主要指导该署积存的美国剩余物资的管理与分配。但是，在行政院管辖下，已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善后物资处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处委会），掌握和处理救济总署遗留下的物资，上海的银行家李铭（馥孙）为主任委员，以其他十多个上海闻人为委员，其中还有美、英籍委员。处委会名义上隶属于行政院，因其成立在事委会前，也不可能明文规定要它属事委会领导，但王

云五认为它当然应归事委会领导。而事实上两会不在一地，处委会掌握物资，拥有实权，会中各部门都有美国人参加工作，副秘书长是美国人麦克米仑，他大权在握，操纵一切，秘书长向景云，仰承其鼻息。我到该会联系过几次工作，也列席过一次该会会议，因而能略有所见。

处委会秘书处设在上海福州路。秘书处辖有一乡村工业示范处，以马杰为处长，贺闾为副处长（马、贺均留过美，习化学），该处的主要业务在湖南邵阳，由美籍副处长斯德沛主持。1948年8月，王云五将要卸去事委会主委，我也将随着离开该会，因事到沪，马杰给我以乡村工业示范处顾问名义（无工资待遇），适值他要往邵阳视察，约我到邵阳一游，我即与他一同飞往。我在邵阳停了两天，又同他到新化县看了一所已停产的手工业造纸厂。时乡村工业示范处拟投资使之恢复生产。而后我即取道衡阳、长沙、汉口先回南京。记得乡村工业示范处在邵阳有汽车和机器修理及小型发电厂，并兼营汽车运输业务。厂子的四周扎有铁丝网，厂内生活很好，与厂外相比，俨然两个天地。

渔业管理处为处委会的一附属机构，以赵君迈为处长。据说救济总署留下有40余只渔轮为该处保管，该处并训练渔民使用。

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也是处委会的附属机构，林继庸为总经理。善后救济总署留下的美国物资中，有些是制造农业机械的机器设备。处委会以这些机器设备作为基础，成立中国农业机械公司，公司的办事机构设在上海，除上海的总公司外，还计划在南京、汉口、长沙、广州、北平、郑州等地设立八个分公司。总公司下设一比较完备的农业机械制造厂，八个分公司设立八个分厂，由总公司从上海分发机器设备给各分公司，作为总公司的投资；还计划在地方上招收一部分商股，作为地方投资，成立董事会，推

选经理和协理。因为资金大部分是总公司投入的，各分公司的经理也当然由总公司派遣，地方上的资本家也不热心投资，推迟了各地区分公司的成立。计划成立的八个分公司的八个厂，南京最先成立。南京为近水楼台，交通便利，南京厂能生产小型农业机械。长沙厂也成立了，但机器设备多未运到，未开工生产。其他各厂因时局关系，交通受阻，概未成立。林继庸是广东人，他把上海仓库所存重要设备都运到了广州，在广州成立了规模可观的农业机械厂。但不久解放军南下，逼近广州，林继庸囊括一切赴香港。

善后事业委员会是王云五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期间成立的。王云五是当时“社会贤达”中紧跟蒋走的人之一，而且没有党派和其他牵扯。这个机构一成立，王云五就想抓先它成立的善后物资处理委员会，但是处委会中连一个他的人都没有。该会开会时，他只能派人列席，被派列席的人亦向不受该会重视，而且该会会务实际是由美国人操纵，他们根本不理王云五那一套。在处委会的大厦里，王云五只勉强要了两间房子，设立了以陈世章为首的办事处。办事处终日冷冷清清，无所事事，陈世章本人都嚷着处委会看不起事委会，要辞职不干。蒋介石先设了处委会，又设立事委会，让这两个机构互相牵制，都不敢脱离他的控制而自由行动。事委会的委员，大部都是有关各部、会（如交通、铁道、工商、农林）的部长、主委、次长、副主委，另外还有前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郑道儒。在王云五任主委的半年多中，只开过一次全体会议。机关事务实在是空空洞洞，不着边际。我虽兼计划组长，但不知要计划些什么，抓不住一点实际东西，常常是把处委会交来的英文文件译成汉文，把事委会发给处委会的汉文文件译成英文，并审核黄泛区复兴局所拟的一些复兴黄泛区的空洞计划。农